

晋方言研究

第三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乔全生 主编

希望出版社

晋方言研究

第三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乔全生 主编

希望出版社

4500万

大包

张呼

吕梁

并州 五台

上党

志延

邯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晋方言研究/乔全生主编. —太原: 希望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5379-4241-6

I. 晋… II. 乔… III. 西北方言—方言研究—山西省—
文集 IV. H1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12798 号

晋方言研究——第三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乔全生
责任编辑: 刘志屏
装帧设计: 冯建华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集团·希望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4123120 (发行部)
0351-4922243 (总编室)

E-mail: xwchs_hope@163.com
网 址: www.xwchs.com

承 印 者: 山西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54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0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9-4241-6
定 价: 60.00 元

鸣 谢

《晋方言研究——第三届晋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是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取得的成果。

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组织汉语言文字学学科的部分教师先后参与了编审本论文集的工作。他们是（以下按姓氏音序排列）：

白平 白云 冯良珍 李小萍 史秀菊 王为民 温振兴 岳海燕

会后，确定由温振兴博士担任本论文集责编，从稿件的编辑、排版，到联系出版社、印刷厂等各项具体事务，基本都由他全力承担，其间付出了许多辛劳。另外，博士生余跃龙参与了稿件的前期收集工作，硕士生张宝玉参与了后期的排印工作。

本论文集的出版得到山西大学重点学科经费的支持。

希望出版社梁平社长和刘志屏编辑为出版本论文集给予了诸多帮助。

谨对以上支持本论文集出版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学界同仁表示衷心感谢！

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时间和水平的限制，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敬请不吝指正！

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

2008年10月

目 录

方言语音及音韵

入声问题——晋语与官话的比较研究之一·····	侯精一 (1)
“异军特起”之著 “包举” “囊括”之著	
——序乔全生《晋方言语音史研究》·····	鲁国尧 (5)
晋方言入声韵演变史·····	乔全生 (11)
阳高县罗文皂镇吴家堡村的Z变韵Z变调·····	王洪君 (17)
北方方言里所见的类音牵引等语音现象	
——以山西方言的“硯瓦”等为例·····	[日本] 太田斋 (18)
万荣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和轻声	
——兼谈山西方言轻声调值的不同类型·····	吴建生 (27)
山西平遥(新派)咸山宕江舒声韵今读音·····	沈 明 (37)
借助晋语了解汉语声调发展细节·····	孙华先 (42)
论晋南与陕南中原官话的源流关系·····	郭沈青 (47)
陕北晋语的入声·····	李建校 (52)
交城方言咸山摄舒声字读音考察·····	苏晓青 杨丽芬 (58)
再析山西方言的舒声促化现象·····	韩沛玲 (62)
晋东南晋语的舒声促化现象·····	王 利 (69)
山西方言影疑母字的演变及分合·····	白静茹 (78)
山西方言遇摄的历史层次·····	孙小花 (84)
兴县方音主要韵母百年来的演变·····	刘 波 (92)
太原方音声母百年来的演变·····	张 洁 (100)
晋城方音声母百年来的演变·····	原慧艳 (107)
关于一百年前兴县方言轻唇音声母的音值问题·····	张宝玉 (113)
太原市南郊区声母的语音特点·····	王文娟 (117)
河北省属晋语35县市方言中的儿化读音·····	李巧兰 (123)
四角标四声的沿革及称谓·····	[中国香港] 张群显 (129)
赵谦《声音文字通》卷数及性质考辨·····	丁治民 (141)
从《徐州十三韵》看二百年前的徐州方音·····	燕宪俊 刘淑学 (146)
从中古知庄章声母再论《西儒耳目资》的基础方音·····	桑宇红 (151)

方言词汇

汉代秦晋方言词汇亲疏关系	[中国台湾] 郑锦全 (157)
论晋语语汇研究	温端政 (163)
从“窑、洞”说起	张振兴 张惠英 (169)
《诗经》与山西方言	刘毓庆 (176)
从晋语体感式形容词看汉语的特点	温锁林 (181)
山西方言地名中的“圪”字词研究	李小平 (188)
元杂剧词汇方言证释	岳海燕 (200)
元杂剧中晋方言词汇选释	张楠 (205)
山西大同话中的“不A A儿”格	袁海林 (209)

方言语法

北方话的“动词+趋向补语+处所名词”格式	[法国] 柯理思 (215)
语气助词 ZHE2 的来源——晋方言与北京方言的比较	[日本] 沈力 (223)
近代汉语句末助词“去”“来”“了”“也”在晋方言中的分布与功能	史秀菊 (233)
河北魏县方言的不定量词“些”	吴继章 (241)
山西阳泉方言的助词“能[·nən]”	曹瑞芳 (249)
陕北绥德话的人称代词	黑维强 (256)
榆社话的人称代词	余跃龙 (266)
太原南郊方言的代词	王文卿 (272)
应县方言的代词	蒋文华 (280)
山阴方言补语	崔霞 (285)
山阴方言的疑问句	郭利霞 (291)
山阴方言祈使词“好”的使用特点及其来源	温振兴 (297)
析山阴方言的“给拿”	武玉芳 (304)
原平方言的句中语气词	李小平 (308)
山西方言“将”的共时和历时分析	崔容 (313)

方言调查及分区

黄土高原的方言是一个宝藏——为第三届国际晋方言研讨会而作	[日本] 刘勋宁 (318)
霍州方言的内部差异及其成因	冯良珍 沈力 (326)
罗杰瑞的汉语方言共同音系	[美国] 史皓元 (335)
第三届晋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温振兴 (347)

人声问题

——晋语与官话的比较研究之一

侯精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北京 100732)

从 1985 年李荣先生提出把晋语从官话分出来,二十多年过去了。晋语的研究在在座的和不在座的各位同行的努力下取得令人欣慰的成绩。我们相信本届晋方言国际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将进一步推进晋语的研究。

重视晋语与官话的比较研究是当前深化晋语研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由于晋语与官话的近邻、亲缘关系。晋语与官话呈现相当明显的一致性。但由于黄土高原的地理环境与相应的地域文化等多种因素导致晋语与官话呈现一种非同步发展(乔全生 2003)。与官话相比较,晋语的演变明显滞后,具有相当的保守性。这就产生晋语与官话的非一致性。晋语与官话的这种特殊关系的存在,为我们研究晋语或研究官话提供很有用的语言资源。用形象的话说,今天的晋语可以看作某些官话方言的昨天,而某些官话方言的今天很可能就是晋语的明天。晋语与官话的比较研究为我们提供一面反映语言历史变化的镜子。这面镜子让研究者既能看到某些语言现象的过去又可看到某些语言现象的未来。充分利用晋语与官话非同步发展的事实,对于晋语与官话两个方面的研究都是有益的。这就是我们强调重视晋语与官话比较研究的考虑。可以进行比较研究的题目很多。本文讨论的是入声问题。

—

晋语与官话的江淮方言都具有入声,晋语与江淮方言入声都收喉塞音[ʔ]。这个[ʔ]还很清晰、稳定。江淮方言有洪巢、泰如、黄孝三片。分布在湖北境内的黄孝片,入声不带喉塞,声调不短促。本文有关江淮方言入声带喉塞的提法不包括黄孝片。晋语的入声与江淮方言的入声还是具有明显差异。

1 晋语通摄一等与通摄三等入声精组字今韵母读音多有分别,一等今多读合口呼,三等今多读撮口呼。官话区的江淮方言则没有这种分别。如,晋语区的太原方言“族”(通合一入屋从)[ts^huəʔ]与“足”(通合三入浊精)[təyəʔ]读音不同。河北晋语区的邯郸方言,“族”[ts^huəʔ]与“足”[təyəʔ]韵母读音也不同。江淮方言的南京方言“族”[tsuʔ]与“足”[tsuʔ]韵母读音相同。合肥方言“族”[ts^huəʔ]与“足”[tsuəʔ]韵母读音相同。(侯精一 1999)

2 晋语曾摄开口一等、梗摄开口二等帮组入声字今多读齐齿呼,曾开一与梗开二韵母的主要元音不同。一等读[ə],二等读[a]。如,晋语文水方言“北”[piəʔ](曾摄开口一等) 墨(曾开一)[mieʔ] | 伯(梗开二)[piaʔ] “麦”[miaʔ]。(侯精一 1999)①

江淮官话这类字音读入声,带喉塞韵尾,但韵母都不带[-i-]介音。曾开一梗开二帮组入声字主要元音相同。如,南京方言“北”[pəʔ](曾开一) “墨”[məʔ](曾开一)

| “伯” (梗开二) [pəʔ] “麦” [məʔ] (梗开二)。扬州方言“北” [pɔʔ] (曾开一)
“墨” [mɔʔ] (曾开一) | “伯” (梗开二) [pɔʔ] “麦” (梗开二) [mɔʔ]。

二

官话区的兰银官话、冀鲁官话、中原官话、西南官话入声舒化, 晋语入声保持独立调类, 有入声的晋语与没有入声的官话仍然有进行比较研究的价值, 因为比较的结果会显示入声演变消失的轨迹。可以说语音的非同步发展不仅是在晋语与官话之间存在, 在官话区内部同样也存在。正是通过方言间各种不同角度的比较研究才得以凸显语音演变的不同历史层次。

从下文所列出的语言事实来看, 兰银官话虽然入声舒化, 从演变的进程来看, 兰银官话在官话方言中与晋语的关系最为紧密。晋语曾梗摄一二等入声字读齐齿呼, 据兰州大学王森调查, 甘肃河西方言(民乐)曾梗摄开口一二等入声字也有读齐齿呼的情况。(侯精一 2002: 31) 同属兰银官话银吴片的宁夏同心方言的北片也有韵母读齐齿呼的。如, 曾开一梗开二帮组及来母字汉民读[-ia]。如“北墨白迫勒肋”。(张安生 2006: 5) 此外, 兰银官话的银川方言曾梗摄开口一二等入声字白读, 也有读齐齿呼的情况。(侯精一 2002: 31)

兰银官话的银(川)吴(忠)片尽管入声已然消失读作舒声, 但韵母与晋方言是一致的, 均读齐齿呼。银吴片北接内蒙古晋语。银吴片和晋语的读音有整齐的对应性。晋语的入声韵就好像是带喉塞音的银吴片白读。以宁夏石嘴山为例: 北[pia] | 墨[mia] | 伯[pia] | 麦[mia]。(张燕来 2003) 银川方言“北墨伯麦”白读[-ia]。(高保泰、张安生 1997)

再看中原官话的表现。以曲阜、西安、天水为例, 曾摄开口一等(“墨”[mei])、梗摄开口二等(“白”[pei])帮组入声字今读舒声开口, 不读齐齿呼, 与兰银官话读齐齿呼不同, 更与晋语不同。(侯精一 2002: 28 表 32) 但中原官话的西安方言通摄一等与通摄三等精组入声字韵母的主要元音仍然有分别, 一等读合口[u], 三等读撮口[y] (与晋语一致)。如西安方言“族”音[tɕu|tɕou]阳平, “足”音[tɕɤy]阴平, 读音不同。

冀鲁官话古入声舒化, 入声韵与舒声韵合流。但是在河北省境内的冀鲁官话与晋语一致还保留曾摄开口一等与梗摄开口二等入声字的主要元音有分别。曾摄一等入声字今韵母为[ei uei], 梗摄二等入声字韵母为[ai uai ie] (如, 保定、石家庄、沧州: 墨 mei | 麦 mai)。(刘淑学 2008)

而在山东省境内的冀鲁官话曾摄一等与梗摄二等入声字白读音没有分别都读[ei]。(如, 济南、新泰、利津、寿光: 墨 mei | 麦 mei) (刘淑学 2008)

冀鲁官话的济南方言通摄一等与通摄三等精组入声字韵母的主要元音也有分别, 一等读合口[u], 三等读撮口[y]。(与晋语一致) 如, “族”音[tɕu]阳平, “足”音[tɕɤy]阴平, 读音不同。

晋语与冀鲁官话在曾开一梗开二入声帮组字读音的不同, 归总为以下三点:

① 晋语曾开一梗开二入声帮组字今读入声, 一等与二等主要元音不同, 一等开口度小二等开口度大。

② 河北省境内的冀鲁官话入声今读舒声, 入声消亡。但曾开一与梗开二韵母的主要元

音不同。二等字主要元音开口度大。

③ 山东省境内的冀鲁官话入声舒化。但曾开一与梗开二入声字今白读音韵母相同。

有意思的是,西南官话鄂北片古曾开一入(德韵)、梗开二入(陌麦韵)今读有带[i]介音。例如:

房县 墨(曾开一) mie 麦(梗开二) mie

竹山 墨(曾开一) mie 麦(梗开二) mie (郭丽 2008)

与晋语不同的是这些地方方言没有入声,古入声字今读舒声。再有,晋语曾摄开口一等、梗摄开口二等入声字带[i]介音仅限于帮组,西南官话鄂北片古曾开一入(德韵)、梗开二入(陌麦韵)今读有带[i]介音不限于帮组。鄂北片此类现象分为四组,襄樊型仅帮组、端系字带[i]介音。郧县型除见晓组外,其他组的字都带[i]介音。晋语曾开一与梗开二入声帮组字今韵母的主要元音不同,一等读[ə],二等读[a]。西南官话鄂北片则没有这种分别。还有一点值得注意,曾摄开口一等、梗摄开口二等帮组入声字多读齐齿呼,在晋语区分布的面相当的大,不仅山西晋语有此种现象,内蒙古、山西、河北、河南四个省(区)的晋语也都有。鄂北片的情况就不太一样,读[i]介音地区的比例大大少于晋语区。^②

通过以上的比较研究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晋语语音与官话语音的不同的历史层次。同时也可以看出不同官话方言的历史演变的非同步发展。

三

关于舒入调型的比较研究。从入声调的调型来看,晋语入声调型(包括连读变调)通常与某个舒声调型有明显的一致性,或同是降调、同是升调。这是晋语声调的一个特点。以单字调为例:

山西大同方言入声不分阴阳,入声与阴平同调型。都是降调型。山西平遥方言,入声分阴阳,阴入与平声同型,都是升调型。阳入与上声同型,都是降调型。

大同 入声 ʔ32 (八) — 阴平 31 (巴)

ʔ32 (夺) — 阴平 31 (多)

平遥 阴入 ʔ13 (急) — 平声 13 (鸡)

阳入 ʔ53 (截) — 上声 53 (姐)。

江淮方言舒入的同型关系不如晋语明显。如,阳入调与舒声调的调型关系呈多元状态。(江苏省志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1998)晋语与江苏省境内的江淮官话在舒入同型关系表现出来的差异映射声调演变的不同路径。此外,从调值来看晋方言阴阳入的调值是阴入低阳入高(晋语区是相当一致的)。江苏境内的江淮官话通泰片除东如一点外其余南通、如皋、海安、如东、泰州、江堰、泰兴、兴化、东台、大丰等点都是阴入高阳入低(江苏省志地方志编辑委员会 1998)符合吴语阴调高阳调低的音高规律,与晋语不同。

附注:

① 桥本万太郎曾指出:“我们发现一个更为有趣的事实,这就是 -i-介音只莫名其妙的出现在晋语的一等和二等的入声字音中。”“在现代北方话诸方言里,只有那些晋语中带有非鄂音声母的入声字包含着 -i- 介音。”(桥本万太郎 1982)

② 具体字音调查记录有些出入。1956 年重印的 1939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赵元任《钟祥方言记》所记录的材料“北白迫墨麦”等字韵母都读[ə]，前头没有[i]介音。（赵元任 1956：36）。《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鄂西北的襄樊市这类字也没有[i]介音。（陈章太、李行健 1996）；郭丽（2008）鄂北片保康、随州“北迫麦”类字也没有[i]介音（襄樊“麦”有[i]介音与《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记音不同）。

参考文献：

- [1]郭 丽.《西南官话鄂北片入声韵带 i 介音现象探析》[J].《汉语学报》，2008(1).
- [2]高宝泰 张安生.《银川话音档》[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 [3]侯精一.《晋语的入声韵母的区别性特征与晋语区的分立》[J].《中国语文》，1999(2).
- [4]侯精一 温端政.《山西方言调查研究报告》[M].太原：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3.
- [4]侯精一（主编）.《现代汉语方言概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 [5]江苏省志地方志编辑委员会.《江苏省志·方言志》[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
- [6]刘淑学.《曾梗摄入声字在冀鲁官话中的不同读音和演变层次》，《中国语言学报》第 13 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
- [7]桥本万太郎.《西北方言和中古汉语的硬软顎音韵尾》[J].《语文研究》1982(1).
- [8]乔全生.《晋语与官话非同步发展》[J]，《方言》，2003-2/3.
- [9]张安生.《同心方言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10]张燕来.《兰银官话语音研究》（博士论文），2003.

“异军特起”之著 “包举”“囊括”之著

——序乔全生《晋方言语音史研究》

鲁国尧

(南京大学中文系 南京 210093)

人们常说：“历史不可能重复。”

可我说：“历史未必不可能重复。”

谓予不信，请读往史：1938年起，至1943年止，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以反对模仿为中心思想的“文法革新”的讨论，“由上海而香港，而重庆，而广东、广西，几乎遍及整个的南中国”（陈望道《中国文法革新论丛序言》）。参加这场讨论的很多当时是，以后更是中国语言学界的名人，如陈望道、方光焘、张世禄、傅东华等先生。讨论的文章，由陈望道先生于1943年集成一册《中国文法革新论丛》。然而参加论战的诸贤当时没有、事后也没有出版过一本“中国话文法”这样的书来。可是几乎与文法革新论战的同时和稍后，却由没有参加笔战的学者出版了几本文法专著，可谓“异军特起”：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1941-1944年），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年）和《中国语法理论》（1945年），高名凯先生的《汉语语法论》（1948年）。以致后代的学子，如果不是专门研究20世纪语法学研究史的，他们知道的只是吕、王、高三家的专书。

上世纪末也有一场辩论，领域不在语法学，规模似乎也不及上述的那场文法革新的讨论，但还是可以算得上是一场学术争论。八十年代中期李荣先生提出了“晋语”这个专门术语，并给他定了位。李荣先生《官话方言的分区》：“从上述三幅《语言区域图》看，官话区的范围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小。徽州方言和湘语、赣语陆续从官话区分出来。现在我们要把‘晋语’从‘北方官话’分出来。”（《方言》1985年第一期）李先生另一文《汉语方言的分区》重申前说：“把晋语从官话分出来，江淮官话仍旧算是官话的一个区。”（《方言》1989年第四期）自“晋语”之说出，其后拥护者有之，持不同学见者有之。记得1998年底，在上海召开了一个汉语语言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我在会上发言时，曾经打了一个比喻，虽然事隔数载，我还自认为我的比喻不乏灼见，值得在今天再向大家推荐。在我们中国，官本位的传统，“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在空前庞大的官员体系里，自应叙官阶，这毋庸置疑，例如经常见到讣告上明白地大写着“享受副部级待遇”、“享受正处级待遇”的字样。但是人们心目中视为比较清静的学校和研究机构也被纳进了官阶系统，而且这官阶系统如今更被强化了，例如前几年上面规定二十几所大学的校长和共产党的党委书记是副部级官员（案，据《报刊文摘》2008年3月某期云，开始时只有8所大学，如今已增至43所，则副部级的校长、书记达86人），又例如某校最近出了个告示，上面任命了两名常务副校长，

并在他们的名字下面加了个特别标志“(正厅级)”。而我呢，早就勇敢地也把官本位传统渗透到语言学中，1998年我在上述的那次上海的会议上说，“晋语”定位的争论，如果采用当前通行于人们生活中的官本位的话语，争论的焦点实质在于，“晋语”是省部级方言还是厅局级方言。主张前者的专家认为，晋语是与官话方言、吴语、闽语、粤语等平级的，如此则汉语有十大方言。后者则认为晋语跟中原官话、兰银官话、江淮官话等同一级别，应该捺到“官话大区”的下位，那自然是厅局级方言了。似乎自晋语为省部级方言之说提出起，这种“省级”、“厅级”之争就开始了，至今未曾稍歇。

可是就在这争辩硝烟纷腾之时，山西学者乔全生却埋首于“晋语”的钻研，数载寒窗，成《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三十余万言。人，总有联想能力的，因此及彼或因彼及此，我于是把晋语级别的争辩史与全生的这本书，类同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法革新讨论与吕、王、高之著的出版，所以我也称全生的这本书是“异军特起之著”。

我之所以称这本书是“异军特起之著”，还有一层意义。侯精一先生的《现代晋语的研究》(1999)说过：“晋语的历史研究，古晋语的研究等重要课题几乎还是一片空白。”而即将在2005年秋冬面世的乔全生的这本书，书名赫然为《晋方言语音史研究》，这不就是填补了空白？这还不能算“异军突起”吗？如果说侯精一、温端政两先生的《山西方言调查报告》(1993)是晋方言研究史的第一座丰碑，那么这本《晋方言语音史研究》应得的评价当是晋方言研究史上的第二座丰碑！其他省部级方言的历史研究确实起步比较早，论著多，成绩大，然而渊源问题的研究无不相对显得薄弱，这是“通病”，有些方言的源头，学界至今还没有提出什么令人瞩目的高见。有些则大有争论，兹举一例：因“五胡乱华”，西晋末年起，经东晋至刘宋时代自黄河流域南逃的大批难民把北方方言带到了江淮地区，鲁国尧认为这是后世的江淮官话之源（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证），而丁邦新先生则认为这些由北方难民带来的语言是现代吴方言之祖（其论证尚未见到）。乔全生教授的这第一本晋语史的著作大书特书：“现代晋方言是唐五代西北方言的直系支裔，汾河片方言是宋西北方言的延续。”提出这一观点岂止是“异军特起”？于整个汉语方言史的研究都有不寻常的意义。

我爱读贾谊的《过秦论》，常在学期末，模仿我的老师仲一侯先生（生于清光绪初年）、魏建功先生（生于光绪二十七年即1901年），在课堂上吟咏这篇名文（案，如今在大学里教古代汉语和中国文学史课的教授很少会吟咏的，看来这传统文化要失传了）。且看它开头的几句何等气势磅礴！“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四个动宾四字格，线性排开，力量啊力量！震撼的力量！如今我给全生的书写序，脑海里就蹦出了贾谊的名文。于是我拈出《过秦论》里的四字，用在全生的《晋方言语音史研究》上，称这本书为“包举”“囊括”之著。

何以如是说？

我认为，天下文章，坚实是第一义。于方言学：是共时描写，就应该去作认真的田野调查；是历时研究，就必须去作艰苦的文献考证。如此，方能做出第一等的文字来。要探究晋方言史，不去寻觅文献、爬梳文献、解读文献、诠释文献，岂能有成？在这里，没有徒腾口说，妄言假设，欺世盗名者的立足之处。全生之所以能在晋方言的领域中，独力走向历时研究，而别树一帜，就在于他遵循“新二重证据法”（即“历史文献考证法”和“历史比较法”的结合）。谈到“历史文献考证法”，我以为，它跟“下死功夫”是等义语，即不间断地用生命迸发的火星去烛照那昏晃里的尘封的钻石细粒。我们翻开他的书稿，金代

李俊民《庄靖集》、明代张慎言《洎水斋诗抄》、清代无名氏《新刊校正方言应用杂字》、祁隽藻《马首农言》、徐继畲《松龕全集》、董文焕《岷樵山房日记》、齐翀《三晋见闻录》，等等，试问，有几个中国的、欧美的语言学家知道这些人名、书名？遑论读这些冷书、僻书。据我所知，只有一人，即乔全生！爬梳、勾稽那点滴的语言史料，“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全生以数载之功，读了古代山西人的大量著作，读了那么多清代和民初的地方志，读了罗常培、邵荣芬、高田时雄、李范文、龚煌城等专家的有关古代的汉语与藏语、西夏语关联的专著，读了如许多的今人的方言论著，……。若不“包举”“囊括”，即无此书。“包举”“囊括”二字，乃全生此书光彩之所在。

我在南京，经常去书店，到北京公干，更是要跑书店。而我每次去书店，总看到若干语言学的新书，著者的大名有的我知道，更多的我不知道，书的内容遍及语言学的各个领域，有的书名很专很冷，每翻阅、抚摸这些新著时，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如今我再次阅读全生的书稿，不禁喜而不寐。近年涌现的诸多新著，它们的质量自然会有参差，但是，于中我仿佛听到了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脚步声在迫近。自鸦片战争失败以来一个半世纪，我们民族总是“被动挨打”，处于弱势、劣势，于是在人文学界，仰视西方学术，而不能或不敢平视之，遂成了“痼疾”。而近年，经济的发达必然带来文化的繁荣，百余年来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民族复兴的理想有可能成为现实。试看今朝，中国语言学人在吮吸自己大地的乳汁，在努力挖掘、继承先贤的学术遗产，在撰写独抒胸臆的论著。我们坚信，中国语言学不能再，也不会再处于模仿、尾随，等人家创造出理论取来“中国化”的可怜境地；不能有，也不会再有如梁启超在百年前所说的那样的人：“视欧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献媚之，乞怜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号称有识者益甚。”

我们已经走在自主创新、原始创新的康衢大道上。

晨曦已现，白昼将临！

二

写序，也是申述自己的学术观点的良机，良机岂可失哉？我的一个观点，全生很同意，我想借此机会较详细地叙述一下。近年，我在平日论学中、在学术讲演时，曾经多次对“×语”和“×方言”的问题提出过自己的看法。现在先从实例说起，最典型的莫如“吴语”和“吴方言”两个词，在今日，似乎是完全同义词，或者用行业话说，成了“自由变体”。非语言学人，各有自己的使用习惯，自然难以强求一律，不过，语言学家如何使用，对他们具有引导作用，则是无疑的。而对当下的语言学界，我以为，需要做一做“正名”的工作。“吴语”一词由来已久，举两个古例，《世说新语·排调》：“刘真长始见王丞相，时盛暑之月，丞相以腹熨弹棋局，曰：‘何乃淘！’刘既出，人问：‘见王公云何？’刘曰：‘未见他异，唯闻作吴语耳。’”这是很有名的，可谓经典例子，又《旧唐书·王伾传》：“伾阉茸，不如叔文，唯招贿赂，无大志，貌寝陋，吴语，素为太子之所褻狎。”假若像词汇史专家那样，去查《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的电脑检索本，肯定会发现更多的书证。（哦，还是自己动手吧。我检索了《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吴语”有411个匹配，当然其中有若干跟语言学的专门名词“吴语”无关，例如古书《国语》卷十九即为《吴语》。而“吴方言”只有一个匹配，即方以智《通雅》卷四十九：“磊 罇。长笺曰：‘罇，磊罇，重聚也，’

丁罪切，今吴方言有之，凡事物烦积而无条理曰磊砢。’智按，今方语皆作累堆，累字平声。”赵元任先生的名著《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中的“吴语”二字是语言学人耳熟能详的用例。而“方言”与“吴”连用为人们习见，其历史浅于“吴语”多多，具体如何，这有待考证，希望词汇史专家也不放过这题目。在当今语言学人的书面语和口语中，“吴语”和“吴方言”相比，显然前者大占优势，请看最近的几本书名：《〈明代吴语字书〉〈同文备考〉音系》（2001）、《南部吴语语音研究》（2002）、《北部吴语研究》（2003）、《明清吴语词典》（2003）、《湘语与吴语音韵比较研究》（2004）。

依我看，要考察现代汉语里“×语”、“×方言”这样的术语的使用情况，需要追溯其渊源。众所周知，如若论及方言分区，必须采用学术术语，究竟使用什么样的名词，问题就凸现出来。在现代方言学时期，起初还是用的“×方言”，到了1948年，则多使用“×语”了。1934年，赵元任先生等《中华民国新地图》的《语言区域图》里，“中国语系”分为“华北官话区、华南官话区、吴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海南方言”七个单位。193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分省新图》第四版《语言区域图》，“汉语系”分为“北方官话区、上江官话区、下江官话区、吴方言、皖方言、闽方言、潮汕方言、客家方言、粤方言”。而到了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分省新图》第五版《语言区域图》，“汉语”则分为“北方官话、西南官话、下江官话、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南话、闽北话、徽州方言”。至1956年，丁声树、李荣二先生的《汉语方言调查》文，所分的汉语八个方言区的名称是，“官话区、吴语区、湘语区、赣语区、客家话区、闽北话区、闽南话区、粤语区。”（案，以上悉据李荣《汉语方言的分区》文，载《方言》1989年第四期）。鄙见：最有影响的当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言地图集》所定的方言术语名称，该图集出版后，这套术语即为大多数业内和业外人士所遵用。李荣《汉语方言的分区——〈中国语言地图集〉图[A2]与图[B8]的说明稿》云：“本图集把汉语方言分为下列十区”，即官话区、晋语区、吴语区、徽语区、赣语区、湘语区、闽语区、粤语区、平话区、客家话区（《方言》1989年第四期）。

李荣先生是我尊敬的前辈大家，但是他将汉语方言的学术名词定为“×语”，窃以为可以商榷，因为这容易给人误导，造成“吴语”、“闽语”、“粤语”等汉语属下的方言与“汉语”平列的印象（打个世俗的比喻，老子跟儿子同名）。我这样说，并非空穴来风，前几年不是有人著长文论“粤语”是独立的语言吗？不是有人将在台澎的“闽语”下位的“闽南话”称为“台语”吗？我认为，科学的分类与命名应该严格，不宜随俗，每个科学名词应该具有单义性和准确性。记得1950年，我念初二的时候，动植物课教给我的“界门纲目科属种”七个字，我至今还能脱口而出。我以为比较合适的处理办法是：在现代的汉语方言的科学分类体系中，只有语言才能称为“×语”如“汉语”、“英语”、“维吾尔语”，汉语的下位只能称为“×方言”，如“吴方言”、“晋方言”、“闽方言”、“闽南方言”（或“闽南话”）等等。如果语言学界的同道同意我的这一观点，那么“吴语”一词就可以腾出来另派用场，二千多年前吴王寿梦、阖闾、夫差时代的自淮河以南至太湖南的语言就理所当然地叫做“吴语”，那是真正的语言，非汉语的一种语言。我们应该让科学术语具有单义性，不能引起混淆。我近几年在内地几所高校，2004年在台湾中央研究院作过名为“古吴语和汉语古吴方言的北域”的演讲，定如此题目自有用心，目的是严格使用科学术语。如今重申我的这个观点，宣传我的这一观点，希望学界诸君子采纳。

2005年7月7日上午10时许我利用Google搜索简体中文网页，兹将搜索的项数抄录如下，此举目的在于，为方言学史和词汇史留下一笔数据：

晋语	6120	晋方言	222
吴语	22200	吴方言	3690
徽语	660	徽方言	56
赣语	521	赣方言	673
湘语	914	湘方言	596
闽语	6610	闽方言	833
粤语	1090000	粤方言	5470

需要说明的是，在搜索的数据中，“晋语”一词下有很大数量是古书《国语》中的《晋语》，如果用“晋语 方言”搜索，则有519项。“晋方言”一词下也有不少是书名《周秦汉晋方言史研究》里的“晋方言”。“吴语”有个别是人名，或人名的前二字。但是，总的来说，以上数据大致可以显示“×语”和“×方言”的使用频率，都是前者的数量大于后者，惟有“赣方言”略略超过“赣语”，是例外。

案，2008年4月18日晨7时许我再次利用Google搜索简体中文网页，所得数据为

晋语	101000	晋方言	4590
吴语	357000	吴方言	48800

其比例：

晋语和晋方言：2005年7月7日：1：0.0362

2008年4月18日：1：0.0454

吴语和吴方言：2005年7月7日：1：0.1662

2008年4月18日：1：0.1366

过两三年我将再来搜索一番，我希望“×方言”的比率升高，尤其希望“晋方言”的使用率直追“吴方言”，那表示，在众多山西学者的努力下，“晋方言”成了一颗耀眼的新星，晋方言的研究臻于昌隆。

在诸种文体中，散文比较自由，序更自由，“上穷碧落下黄泉”，都可以寻踪；“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可以纵论。所以我就充分利用了这自由，借为全生的新著《晋方言语音史》写序的机会，畅谈了我的一些观点，颇感惬意。

2005年7月中旬稿，2008年4月18日补订

编者按：鲁先生随文另附提示语，所指两个字分别是：𠂔 𠂔

长笺曰：“□”提示语请责编同志注意：这个□很难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的《方以智全书》第一册《通雅》第1449页，我查了，它是铅字排印的，错了。应该根据《说文解字》，请查中华书局影印的陈昌治刻本，即俗称的一字一行本，第216页上栏第6字，就是那个字的字头。但那是篆字，在拙文，必须转写成楷书，转写的方法是：左是“立”旁，右是“说文解字”此条的倒数第二字，即“声”上的那个字，请把两个部件拼合。

附鲁先生的信：

我查了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方以智全书》第一册《通雅》第1449页，他是抄的《说文解字》。方框的第1、3、4是“𠂔”，左是“立”旁，右是“郭”的左半部。

第2个 很难写，方以智全书是铅字排印的，不对。应该根据《说文解字》，请您查中华书局影印的陈昌治刻本，即俗称的一字一行本，第216页上栏第6字。

第2个 ，就是那个字的字头，那是篆字，在拙文中必须转写成楷书，转写的方法是：左是“立”旁，右是“说文解字”此条的倒数第二字，即“声”上的那个字，把两个部件拼合。

晋方言入声韵演变史*

乔全生

(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 太原 030006)

摘 要: 本文讨论晋方言入声韵演变史,从历史上看,保留不保留喉塞韵尾都是唐五代西北地区不同方言在晋方言中的投射。保留喉塞韵尾的晋方言并州等片反映的是自《变文》、唐末诗文用韵和罗常培所依据的对音等韵尾弱化以来的特征,不保留喉塞韵尾的汾河片反映的是自唐五代波书及宋西夏汉注音等阴入同韵以来的特征。

关键词: 晋方言; 入声韵; 演变史

晋方言并州片等入声韵保留喉塞韵尾,汾河片入声韵尾均已消失,大多与阴声韵同,个别方言点入声韵自成一类。从历史上看,保留不保留喉塞韵尾都是唐五代西北地区不同方言在晋方言中的投射。保留喉塞韵尾的晋方言并州片等反映的是自《变文》、唐末诗文用韵和罗常培所依据的对音等韵尾弱化以来的特征,不保留喉塞韵尾的汾河片反映的是自唐五代波书及宋西夏汉注音等阴入同韵以来的特征。

《变文》、唐末诗文用韵所反映的唐五代西北的一支方音入声韵尾已发生很大变化,韵尾弱化,可能为喉塞韵尾[-ʔ],应是今晋方言并州等片保留喉塞韵尾的最早源头。唐五代时期的波书以及反映宋西北方音的汉字、西夏文互注音,入声与舒声同在一韵,应是今汾河片入声消失的最早源头。为讨论方便,选取并州片作为晋方言的代表。

一 并州片喉塞韵尾[-ʔ]的历史

罗常培、周祖谟合著的《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认为,“可能在汉代某一种方言中所有入声的韵尾(包括[-k、-t、-p]三类),都已经失去,或变成-ʔ。”(1958)周大璞认为“这恐怕说得过早了。到了晚唐,倒是有这种可能的。”(1979)从《变文》的入声通押情况看,这个结论是可信的。周先生把变文中的入声韵分为八部,并说明各部之间的通押情况,除了同韵尾通押之外,如: [-t]韵尾的质物与月薛通押, [-k]韵尾的觉铎与屋浊、昔锡、职德的通押,还有不同韵尾的韵部通押,如: [-t]韵尾的质物与[-k]韵尾的昔锡、职德的通押, [-p]韵尾的合叶与[-t]韵尾的月薛通押。不管韵尾相同与否,均可以通押。说明当时西北方音入声韵尾确实发生了很大变化。[-p]、[-t]、[-k]尾的区别已经或正在消失,或许已变为喉塞韵尾[-ʔ]了。这些特点从同时或稍后的太原文士用韵中也可得到印证。

唐末山西太原文士用韵深臻曾梗摄入声开始混用。如唐彦谦五古《早行遇雪》二十 7675

* 作者简介: 乔全生(1956—),男,山西临汾人,山西大学语言科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山西大学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博士生导师,山西省语言学会会长,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学和语音史。

*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2BYY009)《晋方言语音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之一。